



江淮抗日烽火

安徽文史资料第二十九辑

目 录

〔历史珍迹〕

- | | |
|--------------------|----------|
| 周恩来副主席给爱国人士刘敬之一封复函 | 吴炳南 (1) |
| 合肥童汉章先生哀辞 | 陈毅 (5) |
| 悼刘政委树藩同志 | 张劲夫 (7) |
| 张治中处理“伊宁事变”的经过 | 陶天白 (10) |

〔峥嵘岁月〕

- | | |
|--------------------|----------------|
| 铜陵八年抗战亲历记 | 朱农 (25) |
| 在抗战烽火中修复淮北大堤 | 郑淮舟 (65) |
| 驻防皖北 保卫阜阳 | 廖运泽 (72) |
| 回忆我任阜阳保安纵队副司令时的几件事 | 冯宏谦 (80) |
| 郭造勋与阜阳人民抗日运动 | 阜阳市委党史办公室 (88) |
| 柘皋大捷 | 李一轮 高韶新 (94) |
| 八年抗战亲历记 | 陈凯荣 (98) |
| 茅坪惨案 | 周进整理 (107) |
| 三峡设防 | 陈景文 (111) |

〔中华儿女〕

- | | |
|---------|-----------|
| 怀念方振武将军 | 陈立人 (123) |
|---------|-----------|

- 一位在抗日烽火中奋起的优秀知识分子 张研国 (126)
悼桂参谋长逢洲同志 孙仲德 (137)
忆唐辉 孙宗溶 (139)
战士与恶魔 万 年 (144)
交通线上的地下兵 马 曙 (153)
回忆爸爸孟芸生跟随方振武将军参加北伐
 和抗日同盟军活动片断 孟宪树 (157)
抗日名将蔡炳炎 周海平 (162)
马吉第身陷魔窟，义存大节 郑克勤 (179)

【文化战线】

-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诞生 赵 戈 (185)
回忆《拂晓报》 庄一方 (191)
对《江淮日报》的回忆 王阑西 罗 列 (204)
《抗敌报（江北版）》出版前后
 王阑西 甘 柏 方 言 (214)
抗战时期的《安徽日报》 唐云青 (219)
我所知道的抗战时期淮北中学 陈向东 (227)
一位立志开发民智的教师 邹洪泉 (238)
活跃在大别山区的一支艺术队伍 马西屏 (241)
回忆程律谱先生 叶少珊 (247)

【订正】

- 我国在抗战期间击毙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
冢田攻大将的经过 刘敬坤 (255)

〔历史珍迹〕

周恩来副主席给爱国人士 刘敬之的一封复函

吴炳南

去年一冬没大冷过。元宵节后，石头城里的柳枝，就绽出了嫩黄细芽，原南京市计委主任、离休干部刘寅同志的新寓客厅，则洒满了阳光，室内花卉、盆景，无不洋溢着盎然春意。

从一九七八年寒冬第一次访问刘寅，算来已有八年头，其间相见数次并偶传鱼雁，这次会见不管是“他乡遇故知”。正当我品尝主人故乡名茶、猴魁香茗时，他取出一份珍藏四十年之久的信札（复印件）相赠，我迫不及待细读起来，啊！竟然是我“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历史文物，真是喜出望外。

敬之先生惠鉴：久违道范，只以事忙，未及时修函问候为歉。忆远岁既两扰堂阶，复多蒙遥寄名茶，隆情厚爱，遂令心焉铭感。顷奉台函备悉。先生历年正面强暴，义薄乡邻，是以招丛忌妒，四构图圈，然犹持身不阿，未肯青黑随染。现且贻及七六老兄，无幸待赎，先生迫得远逃遁薮，避难京都。先生所际至堪同情，而先生所怀尤可景仰矣！承示嘱托，力之所逮，自当勉为。尚望远瞩民主必胜之前途，续作仗义执言之努力。放眼宽怀，善自珍重，至所盼祷！专此
乘复。敬候道安。

周恩来（印章）谨启

四月廿三日

一九七八年盛夏，我曾循着周恩来副主席“因抗战机缘来皖南”所走的山路，到爱国老人刘敬之的家乡安徽省太平县（现改为黄山市）三门村旅居旬日，后转赴南京拜访刘敬之老人长子刘寅，写过一篇记叙周恩来同志道出三门，而遇刘氏父子并为之题词①的散文（见《人民日报》《战地》增刊一九七九年第四期载《三门春暖》）。那次三门行，收获颇丰，有关敬之老人人生平事迹，略知一二。现就周副主席函复刘敬之内容，翻阅当时走访乡亲笔记及有关资料，作点注释。

复函中“忆远岁既两扰堂阶”，系指一九三九年初春，周副主席从重庆经桂林、衡阳、江西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工作，来去两次在刘敬之家小憩并进午餐（前一次由刘家备午餐赶往距三门五里的湘潭村用膳）。当时，周副主席执意要付二十元伙食费，敬之父子再三推让，后由刘寅建议收下捐给三门小学作经费。该校教职员感于周副主席对青少年的鼓励，此后于春茶上市之际，曾多次寄赠本地名茶太平猴魁。遂有复函中“复多蒙遥寄名茶，隆情厚爱，遂令心焉铭感”等语。

敬之老人一八八〇年生于三门村，幼年失学，十二岁进茶叶店为徒，十八岁当茶叶店经理，端瓢茶场三十年。老人从小喜读庄、老书著，习商业后仰慕陶朱，爱看小说及各种演义，晚年喜阅杜甫、鲁迅等诗文。家中常年订阅《申报》、《新闻报》、林语堂编的《论语》以及文学、法律方面的杂志。老人以经营茶叶为终身职业，从一九二四年起，先后兼任过国民党政府区长、乡自治会会长、联保主任等职。他思想明颖，乐善好施，为商、为绅或兼理乡政，颇能以造福乡邦为己任。一九三四年，方志敏、寻淮舟率部经过三门，抚慰百姓，秋毫无犯，老人自此感觉到共产党军队的可敬可爱。北伐时，

军阀溃兵窜境，敬之抵御有方，乡人赞之。主任联保四年，为民垫款数千余元，在一次保甲长和乡绅会上当众表明，悉由他“愿捐乐助”，为民力争废除苛杂，商农称颂为“一乡善士”。他创办太平县北乡小学，“针在树人”，后吸收一批在外埠供职、求学不甘为敌伪办事而回乡的知识分子任教，有的后来参加新四军奔赴前线，客观上起到为抗日输送人才的作用。皖南事变前，新四军素属于驻扎在上饶的第三战区长司令部。新四军干战公务往返，从云岭至上饶，三门村是必经之路。新四军麻村兵站与十河口兵站，相距五十里山路，沿途无一茶饭铺，三门位适两兵站之中，敬之老人将自家宽绰住宅招待来往将士，一宿两餐，收费一角，如此三年未断，接待干战和有关公务人员不计其数，叶挺、袁国平、黄诚常来常往，陈毅、粟裕、谭震林、罗炳辉、项英、邓子恢等将领也曾先后过从歇息，被新四军指战员誉为“义务兵站”，得到中外访问、慰劳团体和新闻、文艺界人士交口称赞与题词留念。顾执中先生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十二月十五日书写：“你老心真不老，救国抗战，不落人后，思想明颖，工作努力，我辈青年还要跟着你走。”同时题写的还有吴大琨先生的“今之孟尝”锦旗一面。菲律宾华侨慰劳团所赠锦旗，书有“义重河山”四个大字。

才遭人忌，美遭丑妒。敬之老人的义举，为当地劣绅侧目，为反动军警难容。一九四〇年农历十二月，老人首次被关太平监狱三个月；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被铜陵、南陵、泾县、繁昌绥靖指挥部某连逮去关押一星期；一九四三年六月，被反动派安靖部特务捕捉；一九四四年六七月间，又遭太平县调查室专员逮捕送县监禁。这就是复函中所提“四拘囹圄”的由来。

一九四五年十月某日，老人得知太平县长即将搜捕他的消息，连夜逃往南京，避居升州路雨花巷云台地三号，在一间阴暗潮湿、以芦席作顶棚的陋室内，屈居数年直至解放。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三日，远在重庆的周恩来，接到敬之函告以后，用航空信作复，对老人“所际至堪同情，而先生所怀尤可景仰……”鼓励他“远瞩民主必胜之前途，续作仗义执言之努力”。复信寄往南京建康路二三二号。刘寅同志带我去实地查看，那是他先父与人合股经营的森昌茶叶店的门牌号码，现改为长红茶叶店，距其住处云台地三号仅百米之遥。

解放后，敬之老人任过皖南人民行政公署委员，出席第一届第一次安徽省政协委员会，被聘为省文史馆馆员。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病逝于南京，享年八十五岁，安葬于江宁县黄金山公墓。

周副主席这份复函对敬之老人所起影响及其所含巨大的普遍意义，毋须我赘述，读者自会通晓。联想曾读王治秋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日载人民日报《难忘的记忆》一文，文中提到周总理谈及杨度的一段话：“凡是为中国革命作过有益工作的同志，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他。”有感于此，遂草就此稿。

(一九八六年四月于太平湖畔观湖楼)

①周恩来同志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途经三门时曾为刘氏父子题词如下：“绥靖地方，保卫皖南，为全联导，为群众倡。”并附注：“正抗敌机缘来皖南，道出三门，两遇刘主任及其公子，谈及捍卫乡里，驱逐日寇，大义凛然，极可钦佩！爰书此应敬之主任及其公子旭初（即刘寅）先生之嘱。”

合肥童汉章先生哀辞

陈毅

童汉章先生安徽合肥人，学生时代即参加五四运动、六二运动，为安徽省青年运动之著名人物。一九二五年北伐军兴，汉章先生即在长江沿岸从事国民党革命运动，为国民党之中坚。北伐军攻克武汉，旋为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之住汉代表。四一二清党事件爆发，汉章先生认为国民党当权派已接受帝国主义策动，从国民革命营垒投入反革命营垒，先生不直所为，毅然以坚决态度，保持其革命立场，不愿同流合污而参加贺叶之南昌起义。旋随军南征并主持革命委员会宣传委员会之工作。南征军于一九二七年冬失败，汉章先生潜回皖东。旋赴凤阳西安等地从事教育事业，隐姓埋名者数年。对国民党当时从事内战之反动政治绝不参加，始终保持其纯洁的革命人格。九一八事变后，复积极从事爱国运动。七七抗战爆发，出任安徽省动员委员会工作于立煌，安徽全省抗战运动，汉章先生出力最多。一九三九年，本军东进收复皖东敌后失地。五路军执行国民党“限制异党异军”之计划，分兵数路大举围攻本军。汉章先生大愤，谓系北伐时代反动清党运动之再度重演，乃坚决返里，站在抗日民主运动方面，与反共顽固派进行坚决斗争。遂出任津浦路西联防办事处主任，从事抗日民主根据地之建设。数年来，领导反敌伪扫荡，领导新民主建设，成绩卓著，为敌伪所震吓，为人民所称道，更为反共顽固派所深嫉，而汉章先生之

革命人格愈为人所钦敬。

汉章先生年过五旬，复力图精进，有志于学。于一九四二年冬请假离职，决定赴延安考察，藉便学习。不料行装甫具，即于今夏罹疾，择地疗养于津浦路东地区。数月僵卧病榻，终于不起。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早二时半，汉章先生溘然与世长辞。一代之革命人才，不永其年，未竟其志，呜呼痛哉！余曩在叶贺军工作，虽与先生同行而无缘拜识。本军东进，余在苏南工作，即久耳先生之令名。今春余入院疗疾，始与汉章先生订交。朝夕谒从，言谈最契。夏初余病愈出院，先生亦将有远行。初不料其罹疾甚速而辞世之更速也！

慨自辛亥革命军兴，从颠覆逊清下及袁、段、曹、吴，均赖各革命党派之力。故革命政党为救国救民之战斗工具，操则存，舍则亡，此不容置辩之真理。惟革命政党必须以利国福民为职志，革命党人依此职志而终身奋斗不息，则革命政党之可贵在此。若夫权位在手，中途变节，变革命政党为一己专政之工具，视一介党员为一己之奴才走狗，是集天下不义之人，日以自私自利，祸国殃民为事，甚至不惜反共叛国投敌一如汪精卫等辈之所为，将天下之黑恶集于一党之内，粹于一人之手，可痛孰甚！国民党两度抛弃三民主义及孙中山先生之三大政策，此汉章先生所最痛恨者也。汉章先生从事国民党工作历数十年，知其善恶，辨其顺逆，其出处纯以福国利民为依归而不愿自奴而奴人。两度之洁身远行，毅然唯真理正义之是从，可谓党人中之佼佼拔俗流者矣！今者抗战大业虽日底于成，而国内法西斯化之反动潮流亦复猖獗弥漫，服从真理，主持正义，盖为时下之对症良药。汉章先生服从真理主持正义之精神，固可为党人之楷模。呜呼！汉章先生可谓不朽矣！

（原载《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

悼刘政委树藩同志

张 劲 夫

树藩同志与我在一起工作，算起来还不到半年的时间，但他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他是在土地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他具有一种天真无邪的优良革命品质，忠贞纯洁而又坦白直爽，是一个从里到外，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心直口快的人物。他是不计恩怨，有意见必提，有话必说，有事必做的人物。他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离开真理违犯真理。他是不怕“上司”，不怕得罪“大人物”，更不怕什么丢脸失面子的人物。他是“有事要多做，无事找事做”，不怕困难不怕危险的人物。他是闲不住的，“清闲无事”对于他简直就是一种惩罚，那是比什么还会难受的。他象一头猛狮子，总是要站在斗争的最前面，他的位置总是在人的前面。他又好象一盆火，到一个地方就是热烘烘暖洋洋的。他又好象一阵风，到了那里总是要摇动树叶吹起水波。他是一个富有丰富生命力活跃而又勇猛的同志，他是我们有着伟大存在力量的同志。他之死立即显示出我们间有着很严重的空虚，不仅是五支队最大的损失，也是我军我党重大的损失。

他在政治部工作的期间，我和他接近谈话要比别的同志多些，这不仅是因为组织科的工作关系要较他科为密切的缘故，而是因为他有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我是要经常向他学习，问东问西。我确是在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学习是交流的；当

然我也给了他以不少的帮助。因此，我们在一块儿工作是彼此都很感觉相当愉快和高兴的。在他到八团工作的期间，是经常要到政治部来找我谈话，倒并未因自己“升了”而就摆弄起来。也许是因为责任重了，谈得比过去更诚恳切实多了。在大通镇我们快分别时，他用极其亲热诚笃的神情，两个眼盯着我，要求我对他在政治部工作时期的批评，当他的眼光与我的眼光接触时，我好象是触电似的受到很大的感动，感觉到人世间只有革命的阶级友爱，才是真正崇高而伟大。只可惜因时间关系，我们未能深语详谈，到今天这一笔债我将如何来还呢！我将如何来和这样一位战友攀谈我们未完的话呢！

树藩同志为党为革命而交付了他的生命，这是应该的，有价值的，光荣的。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在他应该交付他的生命的时候，他要毫不迟疑的把他的生命交付出来，这正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本分。他之牺牲在他个人来说，是算不了什么的，这正是他个人对党对革命最善和最终尽了他应尽的责任。可是在今天我们的工作来说，这是不可算计的损失。所以在今天我们要追悼树藩同志，就要努力来弥补这个损失，就要在树藩同志所洒的血路上坚忍的不折不挠的与敌人斗争，就要坚强而彻底的扫清前进的障碍，勇猛走向前去；一个刘树藩是牺牲了，千百万的刘树藩是要踏着他的血路永远前进的。

刘树藩同志小传

刘树藩同志字白克，安徽六安人。七岁亡父，相依叔父为生，十岁为人牧牛，越三年入私塾攻读四月，复因生活逼迫辍学，就职雇工。土地革命时，刘同志遂投身革命，在故乡做青年工作。一九三二年加入少共青年团（一九三四年转入党内），先为战士、勤务员，后升任班长、排长。四次围剿时随

红军长征，此期间首任政治处团委书记、师团委书记、军委委员。长征后，曾在抗大第三期学习，后派往本军军部工作，去岁过江来五支队，历任组织干事、总支部书记、巡视员、指导员、股长、科长等职。现任八团政治委员。

本年六月二十四日在路西战斗中壮烈牺牲。

刘同志长期艰苦斗争、不屈不挠英勇牺牲之精神，实为后进同志之模范，特为之传。

（原载1943年10月新四军政治部编印的
《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

张治中处理“伊宁事变”的经过

陶天白

解放前，新疆孤悬塞外，动荡不安，盛世才因缘时会，盘踞新疆达十二年之久。起初他投靠苏联，在苏德战争苏联处于不利的时候，他又转投国民党。一九四四年秋，盛被迫去职，吴忠信接充新疆省主席。在此期间，发生了反对新疆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剥削的“三区革命”——伊犁、塔城、阿山（阿尔泰）三个专区的人民武装暴动。三区革命的领导者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艾尼瓦尔木沙巴耶夫、赖希木江、伊力汗吐拉、艾肯木拜克和加等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在伊犁专区伊宁市组织了“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当时国民党中央官方文书称之为“伊宁事变”。下面扼要叙述伊宁事变和张治中奉命处理这个事变的经过。

“伊宁事变”

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四年春天，由于盛世才的暴政，阿山和塔城两地区多次发生人民武装暴动。一九四一年希特勒进攻苏联，当时盛世才还未转向，他号召全疆人民向苏联献金献马，牧民失去了大批良马。一九四三年三月，盛又公布命令，要牧民为国民党部队捐献一万匹军马（见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276页），激起了牧民的愤恨。一九四四年秋，新疆省

政府又在伊犁区大倡献马，伊犁区警察局长高炜、代理专员刘秉德，行为放荡，加深了人民的愤恨。九月二日，法提合、艾尼等以反对献马为由，率领人民在巩哈（尼勒克）发起暴动，攻占了巩哈县府，县长以下全部被歼，无辜的汉族平民也惨遭波及。此时，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坐镇迪化（今乌鲁木齐），派预七师副师长杜德孚前往视察。十月九日，杜飞返后陈述“绥靖计划”，朱以为小题大做，只派少数兵力前往增援。吴忠信派民政厅长邓翔海飞往宣抚。邓到伊宁，大模大样宴客一番，匆匆飞返，报称“无事”。十一月七日，伊宁市枪声大作。十二日，暴动人民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临时政府的民族军在统帅颇里诺夫、前敌总指挥伊斯哈克拜克等领导下分途进击，截至一九四五年九月初，占领了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绝大部分地区，并分兵向南疆进攻。兰新路上有劫车爆炸情况，迪化近郊发现了游骑。就在此时，朱绍良发了加急电报给蒋介石：“事态严重，前途不测，只有一死殉国。”

此时，蒋介石正兴高采烈乘着敞篷汽车游行于重庆市区，庆祝抗战胜利。他接电后十分焦虑，遂即密派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张治中到迪化，任务是：振奋士气，安定人心，考察这次事变的实在情况，提出报告，作为解决问题的参考。本来蒋已命张准备主持东北军政，又要他参加国共和谈，这两项工作都很繁重，但因新疆出现了一个“国”，他觉得应该先让张到新疆看看。

初渡天山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三日，张治中初渡天山到达迪化。当晚

他和朱绍良、吴忠信、郭寄峤（八战区副长官）、李铁军（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等会晤，了解到如下情况：伊宁事变的起因与幕后情况，民族军拥有飞机大炮，有进攻迪化的可能；现在国军与民族军隔玛纳斯河对峙，距迪化只有一百四十公里，迪化守军连军分校的三百八十个学生在内，只有六个营兵力，现在赶调青海马呈祥的骑五军和甘肃徐汝成的四十六师之一部增援，但最快也需八至十天才能陆续到达，如交通无意外变化，粮食、弹药每天赶运，可以支持。吴忠信提供了书面材料。汉族和回族人民惊惶万状，准备逃难。总之，情况危急！

张治中代表蒋一面叮嘱朱绍良等激励部属，加强防务，以示死守；同时请外交特派员刘泽荣约见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叶谢也夫，希望他出面调停。叶说，愿把张的意见转达莫斯科。十四日，张急电向蒋建议：情况紧迫，如迪化失守，将大大影响中央威信，即使归复，亦须花很大力气，请当机立断，立电驻苏大使傅秉常，请苏联出面调停。张发这个电时，征求了朱绍良和吴忠信的意见，他们表示同意。十六日，张飞回重庆，向蒋作了详细报告。

张治中回到重庆不久，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即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提出一份《备忘录》，大意说：据苏联驻伊宁领事报告，暴动人民代表向他表示，原无意脱离中国，其宗旨在争取自治，并列述过去新疆当局对他们的种种压迫。苏联政府关切接壤地区之安宁与秩序，愿意协助中国调停新疆已造成之局势。中国外交部当予答复，大意说：苏联愿意协助调停，甚为感谢。我国政府已派张部长前往调查实情，甚望事变分子代表前往迪化晋谒张部长陈述意见，以便商洽解决。我政府必根据既定政策，使新疆全体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与内地人民得到同等待遇。至于该代表之安全，将力为保障。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到重庆和谈，是张治中奉蒋之命去接的。经过四十三天，签订了《双十协定》，张又奉命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张从延安刚回到重庆，蒋即令他再赴新疆。他面有难色地向蒋表示：处理新疆问题，必须给当地民族以实际权利，同时要采用亲苏政策，才能获得良好效果。他这种意见，在当时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很难通过，因为那些人都是反苏的。蒋为了促其起程，于是以肯定的语气说：“新疆问题，你可以全权处理，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报来。”

再 渡 天 山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四日，张治中第二次到了迪化。此时，伊宁政府代表赖希木江、阿不都哈依尔吐烈和阿合买提江三人已于两日前到达迪化，他们佩戴着“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证章，并声言：他们持有国家证件，谈判时，中国代表也应交验证件。张治中得知这种情况，乃于十五日约见苏联代总领事叶谢也夫，告诉他苏联驻华大使的《备忘录》和中国外交部答复的内容。张说：“我只能以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接见事变分子的代表，不能接见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代表。”经过叶谢也夫的劝告，伊方代表改变了原来的态度。于是，张在十七日接见了他们，和他们谈了四个半小时，维语翻译是何光奎。谈话的题目是：《恢复兄弟间的和气与家庭间的团结》。对过去统治者的高压和中央照顾不周，表示遗憾；希望尽快消除对抗，着手建设，以改善人民生活。张把他们当作一家人看待，他们的态度由严肃变得和缓。张请他们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意见，阿合买提江说：“愿先听听张部长的意见。”张说：“那也可以。”原来他们奉命以独立国代表名义来的，现在情况变

了，他们要向伊宁政府请示后才能作具体表示。

阿合买提江在代表中名居第三，但每次都是他发言。那时他只三十一岁，目光炯炯，态度文雅，唇上留着一撮浓黑的胡子，维族，苏联东方大学毕业，曾被盛世才捕押，由吴忠信释放，是一个思想敏锐、精明强干的人。

十月二十日，张约见了伊方代表，向他们提出了一个《中央对解决新疆局部事变之提示案》。原则是，国家必须统一，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方针是，扶植边疆人民自治，解除其痛苦，促进其发展。并列出一些具体条文。张又向他们说了一番恳切的话，题为《维护国家，服从政府》，要点是，日本拥有一万架飞机，侵略中国，经过八年苦斗，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国共问题，本人两次奉命到延安，毛泽东先生到了重庆，问题大体上解决了。今后就要开展建设。做一个中国人是光荣的。张又详细讲解了《提示案》，说中央的政策是各民族一律平等，今后一定在具体行动中体现出来。伊方代表听了之后，对《提示案》未表示意见，说要回去请示，但态度大有好转，并说过去不知中央政策，只因长期遭受高压，忍无可忍，所以起来革命。张对他们深表同情。

当天晚上，张又和他们谈了五个小时的话，题目是《只有实现三民主义，才能使新疆不蹈过去历史复辙》。他从汉朝一直说到民国，结论是，从整个历史来看，有几个明显的事实：第一，新疆在两千多年前即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全世界公认的；第二，在中央力量顾不到的时候，新疆往往小国林立，互相攻伐，人民遭受极大的痛苦，而外力乘虚入侵，压榨剥削，人民更加痛苦；第三，即使在中央政局不稳的时候，新疆人民依然和中央互通声气，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关系。最后，张又平心静气地评价和批评了过去新疆的一些统治者。他说，我们无